

浅析中国人的百年“美国梦”

何晓明

[摘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的百年中,中国人因为急剧的社会变革,因为本身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曾经一次次地为各样的理想而奔赴美国。美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这些来自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本文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这个问题作了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 中国人;移民;美国梦;手段;目的

中图分类号:D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9)S2—0097—04

作者简介:何晓明,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化。四川成都 610041

世人皆知,起源于成长时期美国的所谓“美国梦”已不仅仅限于美国人的圈子;它是神秘、美好的“新大陆”,令“旧大陆”那些受尽饥饿、贫穷、专制、迫害折磨的人们于无奈中迸发出的向往。它的统一的形式是:移居美国,一切从头开始;而它多样化的内容却因移民们不同的民族、种族、宗教信仰、阶级、社会地位及受教育状况等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我们这里所说的“梦”,是对人生理想的一种形象化描述。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理想,这些理想的长成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培育,更有个人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及受教育状况的决定性影响。“美国梦”作为形形色色人们的人生理想之集大成,其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多样性。它是由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不同理想所构成的。基于此认识,我们就有可能将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人——或者称中国移民——的“美国梦”从中游离出来单独加以考察,由此辨明中国人的“美国梦”在中国移民的特殊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与别人的“美国梦”相较有何相异与相同。

中国人的“美国梦”这一提法似乎有伤中国人的民族自尊。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应该正视它的存在。我们知道一些被广为宣传的“美国人的‘中国情意结’的故事,但我们见闻得更多的是一波又一波为实现梦想而奔赴美国的中国人的浪潮。这梦想始于何时?它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背景的改变又在内容上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支撑这个梦想的历史文化背景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便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19世纪下半叶发生在大清王朝国土上的历次重大事变是中华三千年文明史的必然结果而并非其更深重灾难的原因。遭受自己同胞中官僚豪强贵族恶霸压迫蹂躏了数千年的“黔首”“草民”“贱民”“奴才”们在日渐缩小的世界面前注定要从彼时开始进一步遭受“洋夷”的压迫和蹂躏。受压迫的祖先们梦想着:愿老天保佑今生能遇上个好皇帝再加上几个好天气;而大清末年的“贱民”子孙们有幸多了些选择:在天灾或人祸令人不可活时,他们可以象被逼的先辈们那样揭竿而起,还可在新的大局前选择移民、亡命海外。前者产生了清朝末年大大小小的“乱民贼寇”,后者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做着“美国梦”的出洋者。

彼时的出洋者据史称,多系沿海各省贫苦人家子弟,且无论为受骗抑或志愿出洋为劳工,皆尽许诺数年苦熬后挣得银两当荣归故里。^{[1](P.376)}对早期出洋者的叙述无不包含大意如上的文字,由此可见早期出洋者的“美国梦”中只含有以出洋为手段以获取财富为目的并最终改变自身及其家人社会状况的欲望成分。早期华人出洋者在美国的经历可为这一认识的佐证。活不下去的痛苦及单纯幼稚的梦想支撑着数以万计的早期华工熬过重洋远涉的无限艰辛,迎接他们的是同样艰辛的“苦力”劳作和社会的歧视。他们铺设横贯北美的铁路,他们加入淘金的狂潮。他们是“苦力”是“猪仔”,是一群黄瘦丑陋脑后还拖着条小辫子的人形畜生。他们含辛忍辱只为着能早一天“荣归故里”。他们有梦,有一个激励他们顽强活着并拼命干活的“美国梦”:在那片据说人人都可以借诚实和勤奋的劳动而发财致富的土地上挣上一笔足以

偿清自己和家人所有债务而绰绰有余的财富。这笔财富可令乡邻艳羡,人生由此舒坦自足也!^{[1](P.377)}这是一种植根于本乡本土的中国农民式的“美国梦”,传统的乡土观念、家庭观念和历史造就的世代贫困和屈辱同这梦想紧紧缠绕在一起。这梦想的实质是:以出洋(主要是去美国)为解决一切烦难问题的手段。通过苦劳于据说无所不有的美国以首先解决贫穷问题,在此基础上提高自身及家人的社会地位以获取梦想的幸福。然而,现实总是历史地与穷人的理想为敌。无数的“苦力”被漫长的铁路线吞噬了,又有无数的“猪仔”为淘金的洞窟所掩埋。美国这个强壮无匹的巨人鄙视这群妄图以她为手段的黄种的小人们,甚至令他们就是聊以糊口的稀粥都难以获得。幸存的苦力们两手空空望洋垂泪,为了活命只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中有的人终于历尽艰辛辗转回到了故乡,大多数散居到美国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城市贫民区里苟且偷生,这样就开始了美国一些城市华人聚居区的形成。这些华人聚居的小社区在主要是白人的美国人的歧视和憎恶中悄悄地生长,早期出洋者的“美国梦”也随之静静地由为留在家乡的一切而发财转向为使自己的后代成为美国人而忍辱努力。至于对美国式成功的想往,他们寄希望于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遥远的后代的身上。

考察早期华人出洋者“美国梦”的起始,我们不难发现它所具有的两个特性:一个是求取经济上的发达,另一个差不多可以看做对政治平等的渴求——但这种渴求与别的人群的政治要求有所不同。这种渴求的内容是期望自己在故乡的卑下社会地位和无权无势状况能通过在美国的发迹而得到改变;结果是由“人下人”上升为“人上人”。这种所谓政治地位平等的渴求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根本不能称作与政治诉求有关联,充其量只能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狭隘的“翻身”渴望的再现。然而对历经两千多年专制主义压迫的中国农民而言,“人上人”就是翻身,翻身就是政治。这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政治诉求无法相比较,但却实实在在是中国人的“美国梦”中政治要求的滥觞。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欧洲第二次移民高潮的冲击,美国社会各种族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最大的受害者是亚洲移民,其中尤以华人为甚。华人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精神久已闻名于世。在美国,各阶层的美国人也久已习惯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寻找华人为替罪羊。因此,在诸如

城市犯罪率、人口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面前,美国政府为转移目标缓解国内矛盾,往往采取嫁祸于华人的卑劣手段。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数次排华法案的颁布和排华浪潮的汹涌,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截断了期望圆翻身型“美国梦”的涓涓细流。^{[1](P.381)}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促使许多中国人再渡重洋。不同的是,此时的出洋者几乎全是中国社会政界军界知识界的英才人物。他们胸怀的于其说是“美国梦”不如说是中国梦更为贴切。强烈的使命感和中国国内巨大的变化迫使这些人远赴欧美或去寻求救国强国的真理,或去探访战胜国内敌手的良方。他们大都深受传统文化的深刻濡染,又亲历了传统社会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溃败,个人的命运与党派的前途、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向西方是为救东方,西方是师东方是徒;西方不再是手段而是东方的楷模。此时的“美国梦”所要圆的已不再是个人的富有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一农民翻身型的梦想,而是梦想师法于先进的文明以救亡图存,以振兴衰颓的民族,以重整坍塌的社稷。这一精神无论是早期革命的孙中山还是后来反革命的蒋介石以及从另一方面师法苏俄的红色共产党人都概莫能外。这些中国人的梦想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梦”,其间毫无美国梦欧洲梦苏俄梦可言。

国共战罢,江山易手。妄图借国民党蒋介石之手控制中国的美国人方知红色中国人并非可以轻易压服的敌手。从此,封锁挑衅和反封锁反挑衅成了双方交往的主流。忙于保卫建设新中国的中国人也从此陶醉于自己的胜利而断了做“美国梦”的念头。新中国的建立本身就是世代中国梦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政治制度下,作为手段的美国自然而然不再有值得向往的价值。

中国梦,大陆中国人一做就是三十年:保卫红色江山,反帝反修,一个个五年计划,世界革命的旗手;无数次政治运动,要斩断封资修的黑手……当中国人沉浸于、迷惑于自己的变化时,世界也在变,变得令人迷惘,迷惘到不再能明确分辨出敌我友。

70年代初的中美建交对大多数中国人说来无疑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大事变。多年形成的牢固的信念自此开始崩塌。首先接触到大洋彼岸来客的中国官员和知识界的部分幸存者吃惊地发现:美国人不但没有象我们期望的那样“一天天烂下去”,反而是从各方面展现出过得很好!强烈的

反差就在眼前:一边是贫穷落后和死气沉沉,另一边是富裕先进和生动活泼。中国人渐渐从自己的中国梦中醒来,四顾茫茫,若有所失,梦的残痕仍萦绕于心。由此,一种新的渴求在不知不觉间似令人窒息地开始涌动。

至此,笔者将严格地把中国人的“美国梦”限定在大陆中国人的范围内。因为诸如台港澳等地的华人赴美,其动机已与大陆中国人的动机有了极大的差异,毋庸赘述。

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集体洗脑的中国人如果不是由于官方的“被迫松绑”恐怕是不会有几个人能自己做起“美国梦”来的。既如此,始于80年代而延续至今的“出国热”是由于领导者对国情和世情比较清醒的认识和评估这一命题看来是不会错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无疑是停止了贯彻执行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和政策,代之以把党的乃至全国各个角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这一转变其实将一个沉重而又悲惨的现实明白地展示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在我们妄自尊大地梦想着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时,在我们用阶级斗争的利刃无情地切割自己的肌肤时、在我们为自己的“万吨巨轮”“万吨水压机”而慷慨高歌时,我们已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到了后面。此时的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法制完备、人民富足,已远非“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人可比拟。

第一批美国观光客走进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浑身上下散发着那个彼岸世界富有和骄傲的气息。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身着蓝色和军绿色便服的毫无个性可言的中国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对这些“天外来客”追逐围观。从此,人群中的优秀分子们胸中悄悄荡起想要到大洋彼岸去看看的欲念。“美国梦”去而复来。

时值中国大陆重大的历史变革期,当务之急是从物质上强国。为达此目的,最佳途径便是“师夷之长技”。从70年代末起,经数年的官员交往和考察,中国官方最终决定派出自己优秀的知识分子远赴欧美去“学习资本主义一切好的和有用的东西”。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决定。它从理论上否定了社会主义一切都好、资本主义一切都坏的僵死教条。建国30多年后,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精英成了首批由政府资助赴美取经的先行者。这批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或者叫“美国梦”,那就是为建设自己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而去学习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简言之,即求学报国。这种理想与世纪初革命先辈们的理想如出一辙。然而相同的理想结出的未必是相同的果实。

80年代初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是唱着“东方红”长大的一代。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空洞的解放全人类的雄心是他们共同的外部特征,骨子里传统文化的拖累和信念动摇后的自信缺失才真正是他们的本质。带着这样的矛盾,一干人乘国际航班进入异域。出机场、上公路、穿城镇、进校园。美国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不是课本上学到的阶级压迫、种族仇恨,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而是一个理性的、有条不紊的、繁荣富强的、平等友好的社会。信念一点点崩解,决心一丝丝游离;越来越多的学子们渐渐悟到:人生完全可以也应该换个活法。美国再一次不再是手段而成了目的。我们还记得19世纪末的“苦力”们的梦想,也记得20世纪上半叶的先辈们的理想,美国在他们的追求中一直都是手段而非目的。然而这一次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虽然这目的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还不十分明确,但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很快就会为后来的留学生们和他们的亲友们所感觉到了。

公派出国留学数量有限且“后门”太窄,自费留学的浪潮在国家的许可下便轰然而起。谁也没有想到,这些以“求学报国”为目的的学子们中的大多数,竟在新的时代中开启了移居美国之门。从第一批留学生开始,大多数学生学成后滞留不归。中国政府相应地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的归国优惠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作用不大;国门即开,便再也挡不住冲出去的浪潮。大陆居民中开始悄悄流传一个神秘的字眼——绿卡。家有学子获绿卡者受到邻里的艳羡。国际信函和越洋电话将新移民的生活点滴经渲染后散向亲友之间,美国通过这些新移民将她的引力传递至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此后,驻各大城市的美国领事馆门前终日排起了长队,“美国梦”成了大气候。

是距离产生美?是别离才能生乡愁?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年学子甚至许多中年人都急于要离开?要投向大洋彼岸的他乡?学子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大多只是受到美国先进科技和发达物质生活的吸引。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另外类型的人。他们也在领事馆门前排队,手中紧紧捏着国外亲友或某机构某公司的邀请函。他们是一些年龄比学生们大很多、生活阅历丰富很多的人。他们恋恋于养育了自己而自己奉献了大半生心血的祖国却又欣喜于即将永

远离开令人压抑的旧的一切。他们中大多数正值人生壮年,却已为历次政治运动摧残凋零。他们或是知识分子,或是工商界人士,或只是有海外的亲属。他们十分清楚:彼岸或许就将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归宿,但没人犹豫。他们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离开祖国,那就是躲避。躲避一个自己在其中无能为力的生存环境,去同那些学子们一样“换一种活法”。^{[2](P.126,127)}以上两种人物构成了80年代做“美国梦”的中国人的主流。

随着时日的流逝和了解的日益深入,美国对移民们并不十分友好的一面渐次显露在中国新移民们的面前。美国主流文化主流社会是移民们的向往和追求,然而受文化和肤色的限制华人很难融入美国主流。语言障碍、文化排斥之外,移民们能找到的工作大都报酬较低,为了生存,在国内当大学教授的人不得已去餐馆洗盘子打工也是常事。起初似乎清晰的“换个活法”的决心日益模糊,其理想的绚丽色彩日渐消退;移民美国的目的最终出落为求取个人的成功——即由财富、地位和名望等条件所决定的美国式的成功。然而要取得此种意义的成功对于来自于大陆中国的新移民说来谈何容易!开始有人沮丧失望地返乡,开始有人因劳累因病痛因无依无靠而绝望而不知所从。80年代中国大陆的移民热潮从此因为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在美国的新移民的信息反馈而降温。

虽说降了温,但寻梦仍在继续。90年代中国人的“美国梦”其形态五花八门,而核心内容却相对比较一致——发财致富,这同国内同一时期的主流价值取向正相一致。对于此一时期的中国移民而言,美国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淘金的、镀金的、享乐的、逃避的无所不有。我们无法对这些人的梦想作价值和道德的判断,而只能就事论事以现象而析原因。

综观上述,百年来中国人的“美国梦”都同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条件紧相联系。先民被迫移民是因了极度的贫困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而期望在美国的奋斗能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这是一种立足于乡土文化背景的寻求家族整体命运改变的理想。美国在这种理想中只起着手段的作用,即通过手段的采用以达到在传统社会中改变社会地位的目的。近当代的移民在目的上则与先辈们有极大的不同。对30、40年代的移民而言,美国仍然是手段、是工具,是一个可以向其学习的老师,他们的目的却不再是为改变自身及家族的命运而是为改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落后状况。80、90年

代的新移民一开始仍将美国视为手段和工具,他们的目的是“求学报国”。可是转变迅速发生,他们中许多人最终一去不返。对此我们只能说:多年的假话、大话、空话培育出来的大陆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什么牢不可破的主义的信念,却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的决断力。在一个全新的社会面前,他们看到了所谓人的目的。他们最终为自己换了一种活法,把自己心中人类普遍具有的理想同美国这一特定社会重叠起来,将美国作为自己梦想中的目的。历史地看,这种目的观是投机性的,但有着较长时期的虚伪现实作背景,这种目的观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是完全合理的。政治运动的迫害、官本位社会体制的压抑,这些无疑是产生大量逃避型移民的原因;这些移民的“美国梦”都无例外地以美国为目的,内中饱含了对令他们出走的原因的痛恨和唾弃。以寻求个人成功为目的的“美国梦”在90年代占居了主导地位,它将目的和手段混在一起,也将做梦人的社会成分混杂一处;无论是官、是商、是学还是民,无论有无可能,只要有一线希望,这希望就同发财连在一起,就同“美国梦”连在一起。其社会基础除了中国社会固有的矛盾外,极大的因素正是自上而下的官本位体制所造成的发财机会的不均等。有这个不均等存在,普通中国人就会在仿佛人人都可以发财的社会氛围中为自己尽力找出一条可至机会均等的途径来。移民美国便是一种途径。

中国人的“美国梦”无论是求取个人和家族的发达还是国家的富强,其实一直就是一种向上的理想的追求。它以美国为标的,把基于自身社会的贫穷和不公所产生的理想寄予其中。它为实现这个理想而远涉重洋。它是中国人仍在不断进取这一事实的合理体现,也是中国人至今仍未走多远的不光彩的疤痕。什么时候“中国人的‘美国梦’”这一提法换成了“中国人的美国情意结”,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那些产生此梦的社会条件在中国大地上已然消失了。中国人在经济上真正富强了,政治上真正平等了,社会正义已畅行于神州大地,民主也已不再只是文件精神。那时,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真正平等的各国人民将共有一个人类的“地球梦”。

参考文献:

[1] Tsouin, Wang *The American Kaleidoscope—A Chinese View* [Z]. New York Press, 1988.

[2] 李小兵,孙漪,李晓晓. 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